

I. Maya Plisetskaya

我，玛雅·普丽赛茨卡娅

“永远的天鹅”自传

[俄] 玛雅·普丽赛茨卡娅 著 徐思跃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我，玛雅·普丽赛茨卡娅

“永远的天鹅”自传

[俄] 玛雅·普丽赛茨卡娅 著 徐思跃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Title of the original Russian edition:
Я, Майя Плисецкая (I, Maya Plisetskaya)
© 1994, Maya Plisetskaya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玛雅·普丽赛茨卡娅：“永远的天鹅”自传/
(俄罗斯)普丽赛茨卡娅著；徐思跃译．—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9

ISBN 978-7-108-03141-9

I. 我… II. ①普…②徐… III. 普丽赛茨卡娅, M—自传
IV. K835.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4995号

责任编辑	刘雪枫 杨 乐
装帧设计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9—06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9月北京第1版 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32
字 数	383千字 插图 68幅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48.00元

前言

蒂姆·朔尔 (Tim Scholl)

就像歌剧拥趸们通过音色和颤音识别歌者的嗓音，舞蹈爱好者通过分节或分句的个人习惯区分他们的最爱。然而，当舞者在舞台上度过几十年春秋后，人们所能掌握的可能只是这种对于舞者肢体运动方式较为专业的知识。我们很少听到他/她开口说话。

尽管芭蕾向来被称作“沉默的艺术”，这一领域最杰出的从业者之一——玛雅·普丽赛茨卡娅却从不曾安静。1960年加琳娜·乌兰诺娃退出舞台后，玛雅成为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首席女舞者。而她离开莫斯科大剧院舞台的日子一直推延到了1990年。在此期间，她是前苏联出产的极少数国际名人之一。她出现在艺术电影和纪录片里，并且时常现身电视。她先在俄罗斯的剧院展开巡演，之后将足迹扩展至全球。然而在她成为明星道路上，尤其在事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却布满了障碍以及需要面对的困苦。玛雅的俄罗斯崇拜者们，通过坊间各式流言飞语编织而成的复杂网络听说了这一切。如此的网络在信息被控制的地方往往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一个个人几乎毫不为公众所知的社会里，由于事实的缺乏，围绕普丽赛茨卡娅的传闻四处散播。今天，在她的事业起步近六十个年

头之后，玛雅在公众眼中依然不曾摘下她的面具。

普丽赛茨卡娅之所以与众不同并且能够吸引她的俄罗斯崇拜者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有能力在苏联生活的各个领域游刃有余，而又不完全归属于任何类型。她是莫斯科大剧院的明星却又被谣传为叛徒，她是知名作曲家的妻子却又始终忠于自己的事业，她是首席女舞者却又不能随团巡演，她反苏维埃却又不愿移居国外。

普丽赛茨卡娅的一生所呈现出的矛盾特质开始于她的家庭生活。她母亲的庞大家族在演出界占据了众多席位：包括舞者、演员、设计者。她的母亲是一位默片明星。她的阿姨苏拉米弗和舅舅阿萨夫·梅赛雷尔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领舞，享有“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然而，仅仅因为一个“声名狼藉”的亲戚，便足以体现斯大林俄国时期家庭关系招致的祸害，使得普丽赛茨卡娅本可从名人亲戚们那里获得的帮助化为乌有。普丽赛茨卡娅的父亲是苏联煤矿产业一位颇具前途的官员，1935年却被召至莫斯科遭到了草率的清除。舞蹈家的母亲之后被送往“人民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指丈夫被逮捕的妻子）的劳动营。在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二十周年之际，阿萨夫和苏拉米弗被授予了奖章，而他们的姐姐却在古拉格（Gulag）等待命运的判决，这是怪异荒诞的斯大林时期典型的矛盾局面。

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运动”和“解冻”时期并没有擦去普丽赛茨卡娅档案中的这些污点。在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每次申请出国时都被迫回忆起这些污点。而且每张申请表都要求她表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这是另一个令党蒙羞的因素。

普丽赛茨卡娅显然混淆了政治血统，她对党的事务缺乏兴趣，她的“政治上的不成熟”（整个问题被简单地归结为这一点）意味着西方与这位莫斯科大剧院最闪亮明星的接触只能姗姗来迟。普丽

赛茨卡娅生于1925年，1943年加入大剧院，开始崭露头角。但是直到1959年她才被允许跟随团队出国巡演。在那之前，普丽赛茨卡娅被告知祖国需要她：永远还有一场《天鹅湖》要表演——为斯大林、毛泽东、里宾特洛甫、铁托和其他的显赫人物。

普丽赛茨卡娅最终参加巡演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芭蕾舞团充满活力、激烈冲动的风格与列宁格勒的基洛夫芭蕾舞团小心谨慎的学院做派以及西方人当时了解的保守的古典舞风截然不同。从沙皇时代开始，大剧院就充当着俄罗斯第二舞蹈剧院的角色，但是苏联的中央集权要求舞蹈的首都跟随政府一起在莫斯科安营扎寨。于是大剧院开始，用普丽赛茨卡娅的话来说，从列宁格勒“召唤它的艺术缪斯”：玛琳娜·谢苗诺娃1930年来到莫斯科，乌兰诺娃和莱奥尼德·拉甫洛夫斯基于1944年抵达。

普丽赛茨卡娅与列宁格勒的古典主义的接触——主要是通过传奇教师阿格丽皮娜·瓦嘉诺娃——可谓稍纵即逝。但是普丽赛茨卡娅培养了一种个人化的、带有反叛色彩的风格，弥补了她所缺乏的一流训练和辅导，并使她令人兴奋的舞台表演熠熠生辉。她的大胆在今天的芭蕾舞台上实属罕见，她的跳跃体现了近似于男性化的力量。她纯粹的个人风格棱角分明，充满戏剧感，挖掘了在她母亲家族里似乎每个人都拥有的天赋。普丽赛茨卡娅的肢体少见地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完美形象相类似，她通过肢体所呈现出的流畅和力量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特点。观看过普丽赛茨卡娅首次西方演出的人仍会说起她将整个剧院包裹在她的注视之中，用简要的姿势传递强烈情感的能力。她对奥吉塔—奥黛尔角色的重新定义流传后世，并且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了福金（Fokine）的《天鹅之死》。

几乎在她开始随团巡演的同时，普丽赛茨卡娅着手探索一套更新也更现代的节目，包括《斯巴达克斯》、《爱之传奇》、《宝石

花》。这一系列与众不同而又历经磨难的女主人公形象与她的身体条件和禀性气质相吻合。同时也标志了她同更具体的人物形象及更纯粹的学院技巧之间的断然分裂,而这一切仍然统治着列宁格勒的舞蹈演员们。更重要的是,普丽赛茨卡娅通过这些角色塑造的充满激情与力度的女主人公形象体现了大剧院当时正在形成的新颖、明显具有戏剧性的芭蕾风格。她为大剧院带来了卓然独立的特点,这一点成为了芭蕾舞团的标志。正如普丽赛茨卡娅自己所做的那样,有别于以往的大剧院将精湛的舞蹈与戏剧情节相融合,将展示与表演置于学院技巧之前。

现在她在大剧院的地位稳固确立。普丽赛茨卡娅随即渴望与当时欧洲领先的编舞同事合作。但是她与罗兰·佩蒂以及莫里斯·贝嘉的合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她在舞台上的第四个十年,才得以实现。于此之前,她频繁的外出巡演引发了另一对矛盾。尽管普丽赛茨卡娅在著名芭蕾舞演员(鲁道夫·努里耶夫、娜塔莉·玛嘉洛娃、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以及普丽赛茨卡娅自己的搭档亚历山大·戈杜诺夫)纷纷叛国的年月里广泛地开展巡演,她总是回到俄罗斯。

普丽赛茨卡娅的回忆录帮助解释了她的一生所包含的一些矛盾,从而揭示了一个更大的谜团:苏联与它的艺术家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在一个无阶级社会独特的等级制度里,普丽赛茨卡娅的地位——至少到60年代——高高在上。但是她与其他艺术家在政府操纵者以及艺术官僚手中所遭受的侮辱,挑战着人们普遍持有的苏联艺术家享有特权的观点。总是被迫祈求——获准旅行,创作新作品,获得公平待遇——普丽赛茨卡娅和她的同行更像是18世纪的农奴艺术家,而非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文化工作者。

如果普丽赛茨卡娅只考虑舞蹈,她的自传就会狭窄地聚焦于如

何准备角色，或是如何表演福金的《天鹅之死》。读起来如同首演和派对的罗列。但是普丽赛茨卡娅鲜有机会平静地准备角色。更多的时候她不得不忍受来自同一幢楼里的挑衅，或是与不留情面的克格勃操纵者谈判，后者迫切地想要孤立身处海外的苏联艺术家。普丽赛茨卡娅对她舞蹈生涯的描述包含了一些在她的西方同行难以想象的场景：恳求文化部允许节目上演，或是为将她的父母投入监狱的契卡演出。

普丽赛茨卡娅同样记录了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发生的迅速变化。在斯大林时期，出席大使馆的派对无疑将导致一次克格勃之旅。在赫鲁晓夫的年代却成了新鲜涌现的社会景象。舞蹈家们被要求为大使馆的晚会增色。官僚们用其他需求换取艺术家有限的自由。党对于“为国家服务”最滑稽的解释包括了普丽赛茨卡娅与罗伯特·肯尼迪奇特的友谊，克格勃希望利用它实现进一步的政治目的。

在普丽赛茨卡娅结束回忆时她仍在斗争，这点不足为奇。即便苏联统治和克格勃不再是强劲对手，他们所设置的众多制度依然留存。即便官僚的名字（有时是拥护者）已经改变，他们对现状的影响依然留存，依然令普丽赛茨卡娅厌恶。莫斯科议会大厦燃烧时，她在为自己半个世纪的剧院生涯举行庆祝演出。

随着苏联和它的象征在历史中渐行渐远，一定还会出现其他围绕莫斯科大剧院舞台生活展开的回忆和描述。胆怯一些的舞蹈演员们某天可能会觉得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从而写下在剧院度过的岁月。因为她的坚忍、勇敢、率真，普丽赛茨卡娅并不令人惊讶地成了第一个开口的人。

自序

这本书由我自己完成，所以花了很长时间。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围绕着我有成吨的不实报道。它们的开篇是一些真实事件，然后转向半真实，最终变为难以置信的胡扯和谎言。如果其中不含恶意，那我还真是走运。

我最初的意愿是重塑真相。我的生活的真相。通过我的一生讲述芭蕾艺术家们如何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生存，如何在一个舞蹈行业“领先全球”的国家里生存。

但是如何开始？从哪儿开始？

我从我在十一盘录像带上记录的内容开始。一团乱麻，毫无时间顺序。我认识的一位记者着手把我的录像带写成书。我的书。他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他写了很多，啰唆而又浮夸。在我看来，充满了虚假的智慧。全书建立在一个名叫玛格丽塔的小姑娘的视角上。录像带里我曾偶尔提及当我还是孩子时喜欢这个名字，他由此决定了这种写作方法，并且自认绝妙无比。

也许并没有那么糟。但是那个红头发，名叫玛格丽塔的小姑娘跟我，我的感情，我的灵魂，我性格的精髓毫无关系。我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外表和叙述的事件。不，这不是我的书。我拒

绝接受。那位记者受到了难以承受的伤害。我们争吵。如果一开始你不成功……

第二位记者——合著者采用了非正式对话的途径。他问，我答。其中有一些挺有意思。但是这明显是剽窃——照搬了斯特拉文斯基和罗伯特·克拉夫特的谈话形式。我读过他们的书。

我在巴黎乔治—曼德尔大街拜访加琳娜·维什涅夫斯卡雅时，开始向热情的女主人和我的老朋友不停地询问：谁帮她写了她的书《加琳娜》？我很喜欢那本书；我把它的第一版俄语版带回莫斯科借给朋友们。这在当时是一项冒险，因为《加琳娜》在谢列梅捷沃机场海关官员的“反苏联读物”名单上。维什涅夫斯卡雅的确让苏联当局够受的。如果苏联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在我的箱子里发现了《加琳娜》，就会有麻烦了。

加琳娜提高嗓音，仿佛可以听出她的坚定。“没有人帮我。我自己写的。你也应该自己写。做你自己。我开始的时候也想找人帮忙。但是他们毫无用处。糟透了。你自己写！”

“但是怎么做呢？你从哪儿开始？”

“你记日记吗？”

“是的。一直都记。甚至是现在。”

“那你还需要什么？坐下来写吧！动笔。别拖了。如果自己写就要花很长时间。我用了四年。”

好吧，建议不错。我接受。

但是我一向认为写书的都是些非同一般的人。聪明绝顶。学富五车。现在却有个芭蕾舞演员拿起了笔。这让我想起了一则古老的笑话。一艘大船，跟“泰坦尼克号”差不多，沉入大海，只有两名乘客幸存，因为他们可以漂浮：一位政府部长，他脂肪太厚；还有一个芭蕾舞演员，她脑中中空。

另一个动力。雪莉·麦克雷恩的一个出版商从伦敦打来电话——她给了他我的号码——用结结巴巴的俄语告诉我他对我的回忆录感兴趣。

“我还没开始写呢。”

“雪莉说你的回忆录已经完成了。”

“记者为我写的那些不好。我得自己写。”

“这样，那么，对不起。祝你好运。写吧。”

就在那时我开始动笔。

我写了三年，三个月算什么。不是三个月，是三年！但是在這三年中，我的国家里发生了最不可以思议的事件。

1991年2月，我开始写最初的章节，改革仍旧蹒跚前进，审查制度依旧实施挤压，“团结强大的苏联”依旧存在。旗帜，印章，国歌。首位总统，首位第一夫人，诸如此类……每次我直言不讳，实话实说，我的内心都在颤抖：他们不会印出来的，他们会害怕，他们会让我软化并且修改这些。但我还是写了。

这本书的诞生恰逢时代的交会点。昨天还是大胆冒险，甚至不能提及的一切在一瞬间变成旧闻，仅仅一天的时间。仿佛是一场竞赛，看看谁能更激烈地谴责从前无所不能的组织机构和强大的统治阶级。新的“政治正确”已经出炉，带着被允许的勇气。

我跟不上这种新出现的反传统风气。“我们反对旧世界”事实上，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反对！

诚实的人们，你们有了更多的权利，去反对吧……

但是没有什么比真正大胆的东西更快老去。在这本书的最后章节里，我明显感觉“政治正确”再次改变，刮起了一阵新风。人们厌恶政治。他们烦透了诅咒和揭发。他们受够了阅读布尔什维克所犯下的种种恶行。所以也许，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应该略去克

格勃对我生活的侵扰？只写艺术？只写芭蕾？

不，我什么也不改。我不会为事情润色。我会让它们原封不动地呈现于纸上。而你，我的读者，可以想象在我们国家生活中那不寻常的三年间所发生的剧烈变动。

我为本地的、俄罗斯的观众准备了这本书。但是我也考虑到了远在西方的观众，他们对我们以往奇怪异常、难以想象、无法置信的苏联生活中的偏僻小路，狂乱幻想，以及乔装伪饰所知甚少。俄罗斯的读者对这些了解得非常透彻，甚至比我还透彻。他们可以填补空隙。那么，好吧，跳过这些章节，我从前的同胞们——继续向前。但是那些恰恰正是遥远的读者兴趣所在。我不能写两本书！

还有一点。我提到了一些最近发生的事件，记忆里的新鲜部分。今天阅读这些也许就像在看昨天的曲棍球比赛录像，你已经知道了输赢结果。但是如果你几年后再读呢？许多人都会忘却。而我会提醒他们。我曾经亲身经历。

最后，我在书里用现在时描写了那三年里与我亲近的人，现在他们都已成为过去。我的母亲去世了。阿萨夫·梅赛雷尔去世了……

但是我不打算改变时态。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在，我会加以保留。

那么，开始前进吧，读者们，一路顺风。

1994年2月7日于马德里

目 录

前言 蒂姆·朔尔 (Tim Scholl)	1
自序	1
第一章 别墅和斯莱坦卡街	1
第二章 五岁的模样	5
第三章 亲戚们	9
第四章 斯匹茨卑尔根	21
第五章 学习芭蕾	29
第六章 回到学校和父亲被捕	36
第七章 母亲不见了	46
第八章 基姆肯特	52
第九章 “契卡”的音乐会	59
第十章 柴科夫斯基的《即兴曲》	62
第十一章 战争	67
第十二章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第一年	75
第十三章 舍普金斯基巷的公寓	88
第十四章 掌握剧院的 ABC	93
第十五章 《雷蒙达》	105

- 第十六章 《天鹅湖》 111
- 第十七章 青年节 120
- 第十八章 我的伤痛,我的良药 126
- 第十九章 谁怕谁! 135
- 第二十章 斯大林的生日 143
- 第二十一章 《堂吉诃德》和戈洛瓦诺夫的歌剧 149
- 第二十二章 东奔西走的生活和斯大林时代的终结 155
- 第二十三章 我的印度之旅 164
- 第二十四章 迫害 174
- 第二十五章 我为什么没去伦敦 188
- 第二十六章 团队在伦敦的日子 199
- 第二十七章 我的穿着 212
- 第二十八章 人需要什么 218
- 第二十九章 谢德林 223
- 第三十章 库图佐夫斯基区的生活 232
- 第三十一章 去美国 241
- 第三十二章 七十三个日日夜夜 249
- 第三十三章 我们的薪水 259
- 第三十四章 巴黎之约 275
- 第三十五章 与雅科布森共事 290
- 第三十六章 为何我没有留在西方 303
- 第三十七章 马克·夏加尔为我画像 314
- 第三十八章 十一月二十日 324
- 第三十九章 《卡门组曲》的诞生 341

第四十章	与罗兰·佩蒂和莫里斯·贝嘉合作	361
第四十一章	一段感性的题外话	381
第四十二章	我的芭蕾作品	386
第四十三章	我的芭蕾作品（续）	407
第四十四章	我要公正	422
第四十五章	在意大利工作	430
第四十六章	在西班牙工作	444
第四十七章	无题	461
第四十八章	游荡岁月	473
第四十九章	宵禁	486

第一章

别墅和斯莱坦卡街

许多传记都以对某人最初记忆的思考作为开始。记忆越早的人，开始得越晚。我是否应该寻找另一种开篇方式？

我八个月大的时候开始走路。这个我已经无法记起。但我的众多亲戚都因我过早体现的可动性而兴奋。他们的欣喜是我的自我意识的开启。

我的外祖母在 1929 年夏天过世。我清楚而又明确地记得她的离去。我们家在莫斯科附近租了一幢房子，一座避暑别墅。外祖母已经面色苍白，形如枯槁。屋前的草地上架着一张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镀镍床，外祖母长时间地躺在床上，由一位中医对她进行治疗。这位中医常常戴着一顶夸张的宽边黑帽上门，对着外祖母神秘地比比画画。

那个夏天，上天第一次向我传递了芭蕾的讯息。穿过排列在密草覆盖土地上的木篱笆，有一个封着木板的黑漆漆小屋。它属于安娜·巴甫洛娃的搭档、舞者米哈伊尔·莫德金。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夏天，他已经去了西方。但是他的姐姐住在小小的附楼里替他照看屋子，还种植了芬芳的俄罗斯花朵。它们令人迷醉的香气至今仍留

存在我的记忆里。

我是个任性的孩子，他们管我叫 neslukh，就是“不听话的人”。我曾见过一张上面有帆船的老明信片并对其印象深刻，它让我的第一双凉鞋顺着水流远航而去。母亲为此烦恼。那时要买到童鞋是不可能的。你不得不跑遍整个莫斯科找寻一番。母亲总是自言自语唠唠叨叨：“艰难时期，艰难时期。”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断地听到这句话——艰难时期，艰难时期。我可怜的国家。

我把玩一枚工字针，直到伤了自己的鼻子。母亲带我乘坐一个多言多语的农民的马车去看乡村医生。医生迅速缓解了我的不适。

我无法忍受我的饱含爱意的亲戚们。他们捏我右脸颊的时候就像在从事一项阴谋活动。他们常常会为了我上次之后又长了多少而大惊小怪。我也痛恨上床睡觉，被迫吃下这些亲戚们强塞给我的牛奶面条。他们坚持认为这样的食物能令我更大更强壮。有一次他们又给我强塞，我吐了出来。从那以后，只要听见这几个字我就不寒而栗。

在莫斯科我们住在斯莱坦卡街 23 号 3 栋顶楼第三间。都是三。那是我外祖父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梅赛雷尔，一个牙医的房子。一共有八个房间，全都在一边，斑驳的窗户朝向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道。另一边有一条狭窄的走道通往散发着气味的厨房，厨房唯一的一扇窗映出堆满胶合板木箱的脏乱庭院。外祖父成年的孩子们分占了这些屋子，除了最后的一间，住着钢琴演奏家亚历山大·茨法斯曼。他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并获得了奖章。但他却为当时刚开始流行的爵士乐而疯狂，将古典音乐抛至脑后。茨法斯曼是一个伟大的情人，如同果戈理所说的“草莓”。他的女性仰慕者们总是沿着狭长的过道走到他的房间。昏暗的灯光帮了忙。光线的唯一来源是裂痕斑斑的天花板上一只裸露的、留有苍蝇污迹的灯